

● 孙 引

略论先秦儒家经济思想

不久前上海有一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到新加坡去访问讲学，新加坡的一位政府官员在接见时谈到该国这十几年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信仰中国儒家思想，并用以指导国家的建设，而不盲从西方的经济理论。从这段介绍中，值得我们思考几个问题：1、中国儒家思想及其经济思想是怎样的？2、它为什么能有如此深远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深入去研究先秦儒家的经济思想。

先秦儒家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孔丘、孟轲和荀况，他们的代表作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荀子》，本文所引用的资料都出自这些书籍，不另行注明出处。

儒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哲学、伦理规范、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学说都成为各有系统而又相互联系的思想体系，不仅在中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西方国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欧洲重农学派的影响，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就先秦儒家经济思想而言，如以下的内容和次序。

1、自然秩序观

孔丘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孟轲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强调财富来自大自然，一切要受自然规律所决定。人们应遵守自然规律去获取财富，从而推理出人们的一切活动，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都要适应自然秩序而制订各项准则，要“顺天应人”才能治理好国家。先秦儒家的自然秩序观，到西汉时期董仲舒发展成为“天人感应”说。欧洲重农学派所谓“重农主义”其法文原文为“Physiocratie”，含有自然的统治或主宰之意，其创始人魁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从自然秩序观的要求顺天应人出发，形成了先秦儒家的“人本”和“农本”思想以及类似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反映在经济思想上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与民争利”等等。

2、伦理的经济思想

孔丘特别强调伦理道德规范对人们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有着明显的重义轻利倾向。如何认识和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在先秦各学派中有不同的看法，后世对此问题也不断有争议，成为“义利之辨”。

孔丘的伦理的经济思想，对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以为这是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和丑化劳动群众，其实，孔丘是要求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重视伦理规范，对劳动人民应重视他们的生产技能和作用以及他们的物质利益。因为孔丘还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所重民（小人）、食、丧、祭”、“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丘用伦理规范为剥削阶级脱离劳动辩护，为剥削阶级早已脱离生产劳

动的的事实制造了理论根据，但是，孔丘并无轻视劳动之意，只不过认为生产劳动应该由“小人”去干罢了。

孟轲的伦理经济观点也是很突出的，他说过：“仁义而矣，何必曰利。”把孔丘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进一步发展成“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于是，伦理的经济观点又发展成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不同社会分工的论点了。

3. “农本”思想

孔丘经常赞颂先王之道，推崇周代体制，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的祖先就开始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民之大事在农”。所以，先秦儒家从人本、民本思想出发，产生重“农本”的思想。孔丘和孟轲都再三告诫统治者要“使民以时”、“不违农时”，主张薄赋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富民政策。孔丘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怎样去贯彻重农本的思想呢？孟轲主张“制民之产”，并且提出一种“井地”方案，想让农民能够都有“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他认为这样做还可以形成良好的民风使社会安定，所以孟轲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若民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关于“井地”方案，几乎成了后世的理想的土地制度，凡是讨论土地问题的人，往往都援引孟轲的“井地”之说。其实连孟轲本人也讲不清楚，实质上是一种小农经济模式，它正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经济基础，能够与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

必须指出，先秦儒家虽然重农本，却不轻视工商。受到孔丘推崇的西周，规定以“九职任万民”，其中的一至四职属于农业范围；第五职是“百工，飭化八材”；接下去“六曰商贾，阜通财贿。”工商的地位仅次于农，孔丘曾称赞学生子路善于经商“亿则屡中”，孔丘甚至把自己也比喻为商品说：“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而沽者也。”孟轲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为通之，则梓匠轮輿皆得食于子”。也肯定了工商的必要性。苟况之时小农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他觉察到商业虽属必要，若过度发展，对自然经济不利，所以提出要求“省商贾之数”。“省”不是“废”，苟况并没有完全否定商的作用。在生产与流通之间，客观上要求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商的发展超过了生产发展所需要的规模，并非好事。

4. “均”和“明分”的分配思想

孔丘认为贫富悬殊是社会动乱之源，提出了对财富“均”的分配原则。“丘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他认为贫和富是相对的，不怕社会总财富少，若能比较均匀地分配便无所谓贫富，人们也就能够和睦相处，社会安定就不会发生破家倾国的危险了。由于孔丘特别强调“义”对“利”的制约作用和有严格等级区分的“礼”制，当然不会要求对不同阶级的人实行无差别的平均分配，只是为了不要使贫富过份悬殊。

苟况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社会上穷和乱的问题都是由于人群的无分所造成的，“分”是身份、区分，“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若无贵贱之分则人们“势位齐而恶欲同，物不能赡，则必争。”只有“明分”之后，才能使人们遵照一定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生活。

生产决定分配，在封建生产方式下，要彻底解决分配矛盾是不可能的。先秦儒家的分配思想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也是为阶级差别进行辩护。但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为后世许多进步思想家反对豪门地主的兼并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着进步的作用。

5、“黜奢崇俭”和“导欲”的消费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消费思想，基本上都是崇俭的。孔丘的消费思想是在伦理的前提下倾向于俭，他认为一切消费要符合“礼”的规定，批评管仲的过奢与晏婴的过俭都不合理。孔丘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逊，俭则固。”

荀况认为“人生而有欲”不仅有满足生理需要的欲望，还有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而且是“禹桀之所同也。”他不同意孟轲的“清心寡欲”主张，更反对道家的“去欲”、“无欲”之说，认为这些说法都是不现实的。所以荀况又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换句话说，荀况要求人们在追求欲望的满足时，考虑一下是否符合自己的身份和“礼”的规定，“欲虽不可尽，……求可节也。”用“礼”去“导欲”使人们只追求合理的需要。

6、关于“大同”、“小康”的思想

关于大同、小康的思想见于《礼记》“礼运篇”，有人认为是早期儒家子游氏之作，也有人认为是秦汉之际的作品。在《论语》中也可以找到符合大同与小康思想的说法，如：“老者安之，少者怀之”、“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大同社会是一种“天下为公”的美好社会理想，实行公有制、没有剥削、有着亲如一家的人际关系。但是，它只有在“大道”当行的时候才能实现。而现实的情况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在私有制和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里，只能以礼义为纲纪去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求得社会安定繁荣，人们生活比较美好。孔丘认为素称礼乐之邦的鲁国，有可能进一步推向实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鲁一变至于道），而齐国则有可能达到鲁国的小康社会境地（齐一变至于鲁）。

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开始流行，许多人对早期儒家的大同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例如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中，均称“大同”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也有人怀疑在重视社会等级秩序的儒家思想中，怎么能够产生不分尊卑贵贱、废除私有财产的大同理想呢？其实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在剥削制度的社会里，总是会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与中国古代出现大同思想的同时，在古希腊有过“理想国”的主张，两千多年以后的欧洲也产生过空想社会主义。

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经济思想从自然秩序观出发，强调伦理的制约作用，对财富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提出了见解和主张，而且有系统性，与其哲学、政治思想体系是一致的。所谓“子罕言利”本是俗儒所见，也与上面所分析的事实不符。《论语》中的整句话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是说孔丘更多的称道“命”和“仁”，相对的就较少言“利”了，这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儒家的经济思想毕竟比其大量的政治思想要少些。唐、宋以后的大儒们，如刘晏、韩愈和王安石等，就公开言利了。儒家思想能“因时化而变”不断汲取各家之长，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后世儒家是“外儒而内法”或“外儒而内杂”，随着社会的发展，给儒家思想不断赋以新的内涵，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很大的作用。总之，研究先秦儒家经济思想，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